

“冤家”姊妹篇中的“孪生隐含作者”^[1]

——《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与《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中声音的权力

方小莉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610065)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和《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两个文本的探讨,提出“孪生隐含作者”一说。并在这一概念的指导下对两个文本进行合一阅读,挖掘“孪生隐含作者”在此“冤家”姊妹篇中的立场与观点,从而进一步探讨文本的主题。从《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到《布鲁斯特街的男人》,黑人男性从边缘到中心,从失语到重获话语权,他们最终用自己的声音讲述了自己的故事。男性获得话语权,不仅没有削弱内勒为女性争取声音的战斗力量,反而从侧面起到了巨大的辅助作用。当读者将两本书进行合一阅读时,会发现从《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到《布鲁斯特街的男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深刻地体会到声音的重要性:男性与女性都有可能讲述不真实的故事,黑人女性也不例外;黑人男性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的过程,体会到被剥夺话语权的痛苦滋味,这让他们深刻体会到自己曾加注在黑人女性身上的苦痛,从而使双方都意识到当对方的话语权被剥夺时,真相将会被掩盖。所以对于内勒来说,男人和女人谁也没有权力剥夺对方发出“声音”的权利。黑人男性与女性需要彼此尊重,彼此交流,建立一个在肯定差异性的基础上,彼此独立、平等而又相互联系的空间。

关键词 格罗丽亚·内勒 《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 《布鲁斯特街的男人》 孪生隐含作者 声音

格洛丽娅·内勒(Gloria Naylor)是美国当代知名的黑人女作家。她的第一部小说《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1982)曾获得了美国图书奖。随后,她又依次创作发表了《林登山》(Linden Hills)(1985),《妈妈·戴》(Mama Day)(1988),《贝利的咖啡馆》(Bailey's Café)(1992)。这四部作品之间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构成了内勒的小说四部曲。这四部曲为她赢得了国际声誉,从而为她的写作生涯奠定了基础。在她的四部曲中,“每一部小说都向读者展现了一个黑人女性的社区,在这个集体里,黑人女性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用自己的生命丰富着彼此的生命”。^[2] 这样看来,内勒似乎仅仅是一个以书写黑人女性的故事为中心的作家。然而在1998年,《布鲁斯特街的男人》的发表意味着内勒创作空间与创作思想的

广阔，她并非是一个只关注黑人女性的作家。在美国，对于很多学者和读者来说，内勒与莫里森，沃克三人堪称美国非裔女性文学的圣三一（Holy Trinity）。评论界一开始就将她的作品与莫里森和沃克的作品相提并论。^[3]莫里森与沃克的作品在全世界广为流传。莫里森由于获得诺贝尔奖而世界知名；沃克则是因电影《紫色》的巨大成功而扩大了其作品在大众读者中的知名度；而内勒的作品在学术界外却鲜为人知。毫无疑问，内勒在美国文学界已占有一席之地。但作为一个非裔女作家，她的影响力远远不及美国国内的主流白人男性作家。作为被支配的客体，黑人女作家的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她们一直在为争取自由、平等而努力，努力建构自己黑人女性的身份，发出自己黑人女性的公开声音。格洛丽娅·内勒就是其中一名勇敢的斗士。从创作第一部小说《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开始，她就在为非裔女性的权利而斗争。

一、 孪生隐含作者

在对内勒的小说进行阐释前，笔者首先需要对该论文中所提出的新概念做一个详细的界定。所谓的“孪生隐含作者”，本文是指同一个作家所写的小说姊妹篇中的隐含作者。而所谓的“冤家姊妹篇”则是指两个文本间隐含作者的立场与观点相互对立与冲突。长久以来，对叙述可靠性的探讨始终局限在单一文本内，考察其叙述者与隐含作者间的关系。事实上，若我们将这一概念引入到文本间来考虑，也同样会对文本意义的解读有巨大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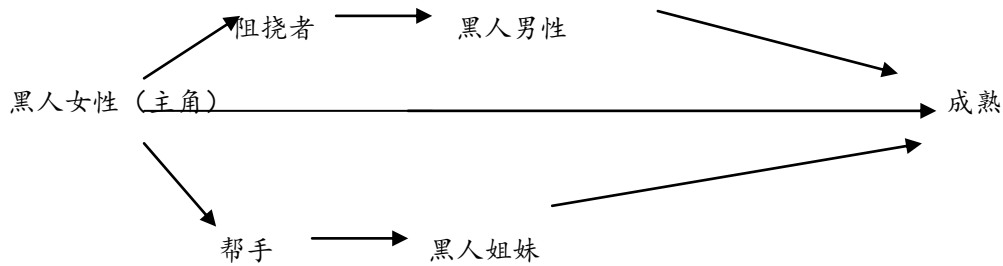
“隐含作者”这一概念是布斯在新批评弥漫整个批评界的时候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将文本内与文本外有机地结合起来，因为我们若考虑“作者”这个文本外因素，必然会涉及文本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隐含作者”这一概念既涉及作者的编码又涉及读者的解码，“就编码而言，‘隐含作者’就是处于某种创作状态，以某种立场来写作的作者”，可见隐含作者代表了文本中真实作者的某种立场与观点。然而这种观点与立场又要依靠读者的解码来完成，因此就“解码而言，‘隐含作者’则是文本‘隐含’的供读者推导的这一写作者的形象”。^[4]有一些作家在某些时期的一系列作品会体现他的同一个观点或是同一种立场。因此对于读者来说，在进行解码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对该作家的不同作品的阅读的影响。特别是有的作家的一个主题无法用一个作品阐述完整，因此会分为“n”部曲来书写，比如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托妮·莫里森的三部曲《宠儿》；《爵士乐》；《天堂》等。另外还有一些小说家会继续写姊妹篇，例如艾丽斯·沃克的《紫色》和《拥有快乐的秘密》（*Possessing the secret of Joy*），特里·麦克米伦的《等待呼吸》（*Waiting to Exhale*）与《迈向幸福》（*Getting to Happy*）等均是相互关联的姊妹篇。在前文本中没有书写完的故事，在后一文本中得以继续。这种关系紧密的姊妹篇必然导致读者在解读作品时被迫将两本书做合一阅读，对两本书的阐释必然会相互影响。再加上小说出自同一个作者，因此就会出现这种孪生隐含作者的现象。在大多数的姊妹篇中，前文本与后文本一般是相互继承，相互支持的关系。也就是说前后文本的隐含作者基本是表达同一个主题、类似的立场，后一个文

本是对前一个文本中的隐含作者的立场与观点的继续与深入。然而也有这样的两个文本，前后两个文本对彼此叙述者的可靠性可以说是致命的毁灭。两个文本中的故事联系紧密，隐含作者的观点与立场却前后冲突，互相矛盾，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冤家姊妹篇”。也就是说，通过先文本的阅读，读者可能认为隐含作者的立场与观点是A，而后文本中隐含作者的立场却是B，A与B看来几乎完全相反。此时，读者开始质疑两本书中叙述的可靠性，也许其中一本的叙述不可靠，但也许两个文本中的叙述均不可靠。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在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变化，作者的这个世界观与人生观有了巨大的改变，因此前后矛盾不足为奇。但是当我们把两个文本进行合一阅读，读者也有可能发现，原来隐含作者想表达的立场与观点是C，既不是前文本中的A，也并非后文本中的B。然而这一答案只有在读者对文本进行合一阅读时才能得出。

二、独立阅读：《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V.S.《布鲁斯特街的男人》

《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一经发表就获得了学界的一致好评。格洛丽娅·内勒的写作能力也得到了广泛的肯定。由于非裔女作家在创作中无法逃避的要面对种族、性别、阶级这三方面的问题，因此大多数的学者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来解读小说《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他们主要将关注的焦点投射在小说的内容方面，解读内勒在她的小说中是如何体现非裔女性所遭受的种族，性别和阶级歧视。《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顾名思义是以女人为中心的故事。小说一共由9个章节构成。第一章叙述者交代了布鲁斯特街的诞生及故事发生的背景。接下来的7个章节分别叙述了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的个体故事和集体的故事。第九章作为小说的结尾，叙述者向我们交代了布鲁斯特街正在走向死亡。内勒认为“一个人物不能代表黑人女性，因为她们的经历是丰富多彩，各有不同的”。因此，内勒在小说中“创造了七个黑人女性，从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黑人女性的缩微世界”。^[5]

在这个以女人为中心的小说里，所有的男性都被边缘化。除了本(Ben)以外，叙述者没有交代其余男性的故事。小说中的男性几乎都是负面形象。他们的存在是黑人女性痛苦的根源。小说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可以看作是黑人女性的成长故事：黑人女性经过各种磨难与痛苦，最终在姐妹们的帮助下重新站起来，变得成熟。对于这些黑人女性来说，她们的痛苦主要来自她们身边的男性。从下面的图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小说作为女性成长小说的情节发展。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在小说的第一个故事中， 玛蒂·迈克尔（Mattie Michael）被爱人引诱怀孕后遭抛弃，未婚先孕的她被父亲赶出家门，独自一人来到南方。在自己的姐妹艾塔（Etta）和伊娃（Eva）太太的帮助下，玛蒂过上了安定的生活。玛蒂独立抚养其子巴西尔（Basil）长大。巴西尔在酒吧因误杀他人而入狱。玛蒂不忍儿子受监狱之苦因此用自己的房子做抵押将儿子保释外出。然而巴西尔由于恐惧再次入狱，因此抛弃了自己的母亲，一走了之。玛蒂自此一贫如洗，被迫搬到布鲁斯特街。她等了一辈子，但是始终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在这一个过程中，玛蒂变得成熟、坚强，并开始尽力去帮助其他与自己有类似经历的黑人女性。与玛蒂一样，小说中的其他黑人女性也分别遭到不同男性的欺骗，抛弃，暴力等不公对待，最终她们在彼此的帮助下变得成熟，坚强地生活下去。

很明显，小说为我们构建了一个黑人女性的社区，在这个社区里，黑人女性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用彼此的姐妹情谊相互鼓励，共同生活。小说显然是赞美黑人女性间的姐妹情谊而批判黑人男性的暴力、压迫与毫无责任感。黑人女性虽然遭受各种压迫，但是她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姐妹情谊。在彼此的帮助和相互的支持下，勇敢面对生活逐渐变得成熟。而小说中的黑人男性则是黑人女性痛苦的根源，是他们的背叛，抛弃，暴力等让黑人女性的生活苦不堪言。在小说《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内勒从黑人女性的视角书写了黑人女性的个体的经历，并将其最终汇聚成黑人女性具有代表性的群体的经历。在这个以女性为中心的故事中，男性是被边缘化的客体。

然而事隔近 20 年后，格洛丽娅·内勒又发表了她的新作《布鲁斯特街的男人》（1998），这一大逆转几乎推翻了对《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的一切解读。在小说《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中，男性获得了话语权，他们拥有了讲出自己故事的机会。小说《布鲁斯特街的男人》开篇讲述了本（Ben）的故事，他在前一个文本中也最先出场，随后小说又分别讲述了玛蒂的爱人、儿子的故事，尤金（Eugene）的故事，伍德神父（Reverend Woods）的故事等。而这些故事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中却几乎只字未提。读者在先文本中只能看到女性眼中的男性，只知道这些“罪大恶极”的男性给女人带来了无限痛苦，并不能了解这些男性的成长及其背后的故事，因为在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故事中，男性被边缘化，被剥夺了话语权，他们不能讲出自己的故事。然而时隔多年后，作者笔锋一转，将关注的焦点从女性转到了男性，并赋予其话语权，让他们用自己的声音讲述出了自己的故事。玛蒂的爱人因为她离开而伤心欲绝终身未娶，而她的儿子因为愧疚，一直都偷偷守护在母亲周围，直到母亲去世也不

敢见她。自此，他也努力成为了像母亲一样的人，尽力去帮助周围的人；而在另一个故事中，尤金告诉读者他之所以一次又一次的离开西尔（Ciel）是因为他渐渐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同性恋。由于他不能放下对西尔的爱，因此他虽一次次地离开，但是却又一次次地回来。由于怕给西尔带来更大的伤害，他最终选择永远离开她。在其它的故事中我们都几乎得到了与《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中不一样的信息。

这样看来，内勒似乎在多年以后改变了对男性的观点，因此在《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中让他们的形象有了大逆转。然而，这一逻辑并不成立，因为男性的形象的逆转是以牺牲女性正面形象为前提。如果肯定了《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中的男性正面形象，那么就证明《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中叙述的不可靠，那么该文本中曾建立起来的女性正面形象则面临极大的危机。以牺牲女性形象来歌颂男性绝不是内勒的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读者不得不怀疑两本小说中叙述者的可靠性。叙述者为什么在第一本书中故意扣押如此重要的信息，“误导”读者去相信男性的负面形象，却在第二本小说中将信息补充完整，甘冒导致叙述可靠性遭到质疑的危险？在《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中，小说人物基本都是用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么他们的叙述又是否可靠？小说的隐含作者的立场与观点是什么，实在令人费解。这一系列的问题要得到解决，我们必须将两本书进行合一阅读，进行综合考察。

三、合一阅读：《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布鲁斯特街的男人》

要试图进一步探讨书中隐含作者的立场与观点，我们不得不将两本书进行合一阅读。并将研究进一步深入到作者身上。通过考察作者的编码与读者的解码从而考查文本的意义。

《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从各方面来看都与《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密不可分，因此强迫读者必须做合一阅读：

从书名来看《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和《布鲁斯特街的男人》只一词之差。看到其中一本，自然会联想到另一本。《布鲁斯特街的男人》出版时封面就标明“《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的作者”（“the Author of The Women of Brewster Place”）。小说开篇第一页，首先就引用了《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中的一段话，而随着故事的叙述，读者可以读到大量从《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中直接引用的文字。可见作者与出版商，均将两本书视为先后文本，强迫读者合一阅读。前一本是以女人为主角而后一本则是以男人为主角。而两本书中的女性与男性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布鲁斯特街就是他们天然的联系。共同生活在布鲁斯特街这个被外界遗弃的世界里，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拥有共同的命运。布鲁斯特街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被迫来到这里，而他们之所以不离开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其次

《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中出现的男人们除了一个小孩子以外，都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中出现过。他们是这些女人的爱人，孩子，情人。从情节来说，两本书中的故事情节也是相互联系紧密，男性与女性的故事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组成部分。前文讲到《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中的第一个故事是关于玛蒂。她被爱人与儿子抛弃，最终一贫如洗。读者所听到的是叙述者从玛蒂的视角向我们讲述的故事，由于其爱人与儿子的故事越出了玛蒂的视角范围，因此读者无从得知。在第一本书中叙述者没有将声音交给男性，让他们讲出自己的故事，因此玛蒂的儿子与爱人在读者心中自然留下了“罪大恶极”的形象。因此只有将两本小说作合一阅读才能看到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

另外要考察隐含作者的立场与观点，我们也不得不关注小说的真实作者的信息。在接受采访时，内勒曾说她作为一个作家的目标就是将声音赋予那些被剥夺了声音的群体，而很多时候黑人女性都被剥夺了声音。^[6]从引文我们可以看出两点：首先内勒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书写女性，这一点在她的四部曲中显而易见，因此她不会以牺牲女性的形象以达到赞美男性的目的；同时我们也看出内勒对“声音”的重视。事实上，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声音问题”事关生死，极为重要。小说共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关于拯救与重生，而另一个则关于毁灭。^[7]西尔获得了拯救与重生是因为恢复了声音，而萝林（Lorraine）遭遇毁灭是因为声音被剥夺。当西尔的孩子因意外死去后，她完全放弃了自己，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葬礼结束以后，社区的姐妹们到家中看她，然而“西尔只是用点头来感谢她们的善意，她的嘴唇虽然动了动，但是却发不出声音。似乎她的声音太累了，以至于不能穿过咽喉传达到嘴边”。^[8]玛蒂意识到“她的声音完全被压抑，她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9]因此她“坐到床边，用自己巨大的乌木色的手抱住西尔瘦弱的身体，轻轻地摇着”^[10]她一直摇着，将生命与温暖传递给西尔，接着西尔首先是“呻吟”，随后是“抽泣”，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最后西尔大哭起来，然而玛蒂知道她的眼泪终将停止，她很快会入睡而清晨也即将到来。”^[11]从失去声音到恢复声音，西尔获得了重生。声音从“呻吟”到“抽泣”再到“大哭”，西尔渐渐恢复了意识。“声音”是生命的象征。

如果说寻回声音让西尔拥有了新的生命，得到了重生，那么萝林则因为被剥夺声音而生不如死。萝林被贝克及其同伙强奸的场景触目惊心，让读者难以忘记：

他重重的拳头迫使空气进入她收缩的喉咙。她试图让自己刺痛的嘴呼出一直以来刻在自己内心的那个词——“求求你”。这个词艰难地穿过她无力的声带，了无生气地倒在了他们脚下。萝林强行闭上眼睛，用自己体内剩下的所有力气将这个词再次推了起来。

“求求你。”^[12]

萝林试图通过叫喊出“求求你”来求救。内勒将这一个单独的单词独立成段，并将其置于引号之中。这一做法使得这个单词具有了音响效应，从而让读者直接感受到人物自己的声音。如申丹所说，直接引语能够产生音响效果。^[13]这显示了萝林在最初依然有声音或者至少试图用力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然而“这六个孩子随手用旁边地上捡的一个脏纸袋堵住了她的嘴”，^[14]从而也就堵住了她的声音。“她只能睁大双眼，用自己的眼睛尖叫着，冲着面前的孩子们尖叫着。”^[15]虽然叙述者坚持用“她的眼睛尖叫着”，但是这时读者再也无法听到她的声音：“她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交换了位置，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压到她身上——这接连的痛苦折磨迫使她的眼睛持续尖叫出那个她这一生都注定要一次又一次说出的词。求求你。”^[16]在这里，读者会看到，“求求你”一词已经从直接引语变为了间接引语。同时由于它独立成句，因此可以同时看作自由间接引语或自由直接引语。虽然叙述者还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萝林呼救，喊出自己的声音，但是引号的消失则证明一切努力均是徒劳，她最终被剥夺了生命的希望——声音。自此以后萝林就疯了。失去声音，她在精神上死亡了。

“对于当代女性主义者，没有任何哪个词比“声音”这个术语更令人觉得如雷贯耳的了。对于那些一直被压抑而寂然无声的群体和个人来说，这个术语已经成为身份和权力的代称。正如露丝·伊里盖蕾所言，有了声音便有路可走。”^[17]可见，作为长期被剥夺了声音而寂静无声的黑人女性来说，找到自己的声音就是恢复了自己的生命。因此内勒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中用女性的声音讲述女性的故事，向我们揭示了声音的重要性。虽然故事由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来叙述，但是这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并不像传统的全知叙述者那样居高临下，对故事中的人物评头论足。她虽然知道每一个人的故事，被授权讲述这个黑人女性群体的故事，但是她总是聚焦于每一个角心人物，进入她们的内心，通过她们的眼睛去看待周围的人和事，从她们的视角来讲述故事。此外，作者还采用各种形式，让黑人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可以看到，在小说的每一个故事中作者都采用了大量的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和自由直接引语。这使得读者在故事中不仅听到叙述者的声音，同时还听到了各个黑人女性人物的声音。

芭芭拉·克莉斯琴说：“如果黑人女性不自己讲述自己是谁，那么她们的机会就会被不怀好意的人窃取，并发出对她们不利的言论。”^[18]因此黑人女性只有获得自己的声音，才能讲述自己真实的故事。如果说当黑人男性抢夺了黑人女性的话语权，他们就会发出不利于黑人女性的声音，讲述不真实的故事，那么《布鲁斯特街的男人》的出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谁也不能被剥夺发声的权利。因为当黑人女性剥夺了男性的话语时，她们也可能像男性一样不讲述事实。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中一个个罪大恶极的黑人男性在《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中大都成为了正面人物。即使是强奸萝林的贝克，作者也引导读者去关注造成他这一行为的社会原因，将其塑造成为社会的牺牲品，从而诱发读者的同情心。从《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到《布鲁斯特街的男人》，黑人男性从边缘到中心，从失语到重获话语权，他

们最终用自己的声音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事实上，男性获得话语权，不仅没有削弱内勒为女性争取声音的战斗力量，反而从侧面起到了巨大的辅助作用。当我们将两本书进行合一阅读时，我们发现从《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到《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深刻地体会到声音的重要性：男性与女性，无论是哪方被剥夺了话语权都有可能讲述不真实的故事，黑人女性也不例外；黑人男性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的过程，体会到被剥夺话语权的痛苦滋味，让他们深刻体会到自己曾加注在黑人女性身上的痛苦，从而使双方都意识到当对方的话语权被剥夺时，真相将会被掩盖。所以对于内勒来说，男人和女人都一样，没有谁有权力剥夺对方发出“声音”的权利。跟男性一样，当女性获得话语权时，她仍然可能如男性一样剥夺对方的权利。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中，由于故事是通过女性视角叙述，因此她们无法深入到男性的心理，无法看到男性的视角所能看到的事物。玛蒂直到去逝也不知道她深爱的人从未背弃她，而她的儿子也渐渐成长为一个像她一样的人；而西尔也永远不知道她丈夫的痛苦，他是为了她的幸福才离开她，正如尤金所说：“她老是问我为什么一次次的离开？但这并非是正确的问題。她应该问我为什么总是又一次次的选择回来？”^[19]因为他们两个的视角不同，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因无法看到尤金离开家后的挣扎，西尔只能看到他对自己的抛弃。因此男性与女性只有共同分享发出声音的权利，用自己的声音讲出自己的故事，那么人们才能够了解到相对完整的事实。

从《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到《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内勒的目的是向我们展示一个完整的黑人的缩微世界，在这个世界，黑人男性和女性应该享有同等的话语权，用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不仅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同时需要阅读彼此的故事，这样他们的人生才完整。如果玛蒂知道爱人和孩子的故事，那么她的人生会更加幸福。西尔和其他黑人女性也同样如此。布鲁斯特街是他们天然的联系，他们属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社区，面对同样的情况，黑人男性与女性需要彼此尊重，彼此交流，建立一个在肯定差异性的基础上，彼此独立、平等而又相互联系的空间。

文章来源：《国外文学》杂志，2012年第2期

注释：

[1] “孪生隐含作者”此一现象虽然由笔者首先提出，但是将其命名为“孪生隐含作者”乃是笔者与赵毅衡先生讨论时，由先生提出。特此说明与感谢。

[2] [3] Margaret Earley Whitt, *Understanding Gloria Naylor*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9), p. 1, pp. 1-2

[4] 申丹, 王亚丽: 《西方叙事学: 经典与后经典》,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72 页。

[5] Maxine Lavon Montgomery, ed. *Conversations with Gloria Naylor*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4), p. 115.

[6] Sharon Felton, Michelle Loris, ed. *The Critical Response to Gloria Naylor*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7), p. 6.

[7] Annie Gottlieb, "Gloria Naylor"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August 22, 1982), p. 4.

[8] [9] [10] [11] [12] [14] [15] [16] Gloria Naylor, *The Women of Brewster Plac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Ltd, 1983), p. 102, p. 102, p. 103, p. 105, p. 170, p. 170, p. 170, p. 171.

[13]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302页。

[17] 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3页。

[18] Barbara Christian,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 Perspective on Black Women Writers*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Inc., 1985), p. xii.

[19] Gloria Naylor, *The Men of Brewster Place* (New York: Hyperion, 1998), p. 70.